

海外奮鬥六十年

陳篤周

生於憂患時代

西元一八四〇年的中、英鴉片戰爭，拉開了中國近代悲劇的序幕。自此以後，東、西帝國主義者看穿了滿清政府的軟弱與無能，遂紛紛伸展其嘴吻，對著這一片肥大的秋海棠葉，肆其蠶食鯨吞，中國真正遭遇到了亡國滅種的危險時刻。

西元一八九〇年，我在國家憂患重重中，出生於廣東省新寧縣一個舊式家庭裏，在我三四歲的時候，父、祖、伯、叔、兄長們已教我讀書習字，先從百家姓、三字經、千字文入門，然後循序漸進，到十六七歲，已經讀完了四書五經、先秦諸子、史記、資治通鑑等書。老實說，我當初讀那些書，完全是被別人牽著鼻子走，在竹枝木棍的威脅之下，一天到晚死背死記，就算盡了義務，至於書中的意義，我完全莫明其妙。像這樣的讀書方法，陳舊落伍，不求甚解，本來是沒有什麼用的，所以，總覺得索然寡味，毫無興趣可言。不過，迨後來年事漸長，理解力加強，

再去重溫那些書籍，便又覺得趣味盎然，不忍釋手，而我的國學基礎，就是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奠定的，至今受用無窮。

大家都知道，我們廣東由於地理的特殊關係，成了中外接觸一個最頻繁而又最敏感的地方，對於外國的情形，較之內地同胞知道得自然多些，雖不敢說得風氣之先，但廣東同胞的思想，比起來是要新穎一些，激進一些。舉一個例子說吧！當內地在教育上還是採取塾師制時，我們地方上就已開辦了好多所新式學堂，不過所授學科沒有現在學校那樣的完備罷了。記得我在家裏讀完那些古書之後，正好趕上我們縣裏在好些關心教育的前輩倡議之下，創辦了一所新寧中學，學生則由縣政府指定在「縣考試室」應考，凡錄取者分別編入文科與實科。文科不待解釋自明；實科所授課程則多為自然科學和一般初級的實用技術，所以，它是一所包含了普通中學和職業學校雙重學制的中學。

我在家人的鼓勵之下，參加了此次的入學考

試。考試的科目除了國文和數學外，居然還有英文。同時，我又發現應考的人中，大致可以分為二派，姑且名之為「本地派」與「僑生派」。本地派的考生，從未出過國門一步，所受的教育完全限於國學一門，至於數學和英文，大家連題目都看不懂，更甯說成績如何了。反之，所謂僑生派以旅居港、九者為多，學校能夠說辦就辦，而且後來越辦越好，原因之一還得歸功於他們的家長重視鄉梓教育，踴躍輸財出力。僑生們在數學和英文二科占了很大便宜，但國文卻遠不及本地派。那時候的國文題目，多半是從古籍中摘取兩、三句或一小段意義深長，但卻艱澀難懂的話，要你放言高「論」一番，而僑生們在這方面可以說都是「下里巴人」，唱「陽阿薤露」已經不容易，唱「陽春白雪」就沒法子搭得上腔了。所以，三科考下來，我們向僑生們打聽數學和英文到底考些什麼？他們反問我們國文是什麼意思？經過這樣子交換意見，無論本地派或僑生派，莫不搖頭歎息，因為每一個人三科中至少有一科是零

分，就誰也不敢希望榜上有名了。因此，有些考生真像被打敗的公雞一樣，垂頭喪氣，覺得「

無顏見江東父老」，倒是我比較看得開，對他們玩笑的說：「要是我們都考不上，學校豈不是要辦不成了嗎？」有些考生聽了，覺得我這話倒也有幾分歪理，便又笑逐顏開，恢復了不少信心，大家等著看榜。

第二天榜便貼出來了，大家的信心又隨之動搖，誰也沒有勇氣去看。然而天下事往往有出人意表者，後來事實證明，卻是一榜及第，沒有一個漏「網」。

原來那時候還有不少年長的人，對新式教育毫無認識，所以不表好感，也反對他們的子弟報考，故報名的人並不踴躍。以致我們這些報了名也應了考的，即使「照單全收」，還不够學校預定錄取的名額，真是幸運。

錄取以後，接著就是分科。照我們的想法，大概國文程度好的理應編入文科，英、數程度好的則編入實科。詎料到了上課那天，纔知道與我們的想法又是恰好相反，也就是說凡國文程度差的，都編到文科；英、數不行的則編入實科，我自然也就成爲實科的一員。

兩科的學生都集中在「縣學宮」上課，由於管理甚嚴，我們的學業都進步得很快。教職員皆負責盡職，尤其兩任校長岑錫祥、黃舫周先生，爲吾粵名儒，在他們的擘畫和領導下，校務蒸蒸日上，學生人數也不斷增加。二十一歲那年，我已讀完四年的全部功課而順利畢

業，旋即受聘爲台山縣潢村育秀小學高年級教席。一個甫離校門的二十一歲青年，實際上還祇能算是一個「超齡兒童」，因爲學驗兩欠，即要負起作育英才的重責大任，自不免誠惶誠恐，舉手投足都自覺不像「先生」模樣。但由於我的好勝心強，無論做任何事，除非不接手，否則，寧可廢寢忘食，也要把它做好。就這樣，經過幾年的磨練，以致以學，終於獲得校長的賞識和同事的讚許，使我的精神收穫大於物質收穫。這一段時間，真是我畢生難忘而又回味无穷的。

初聞革命大義

一代偉人 國父孫中山先生是一八六六年出生的，大我二十五歲。當我五歲時，國父正好三十歲。這一年，我第一次聽到老一輩的人喁喁私語談到 國父正在秘密進行推翻滿清的運動，覺得很有趣。從此以後，地方上祇要有兩三個人在一起閒聊，無論從甚麼不相干的話談起，最後總歸要扯到 國父的革命上來，因此，我聽的越多，對於 國父爲什麼要領導革命，推翻滿清，也就越了解它的意義實不尋常，這時全身的熱血便不免要沸騰起來，恨不得自己也能加入 國父的革命陣營，爲「驅除鞏虜」盡一分力量，救同胞於水深火熱之中。後來我入新寧中學讀書和在育秀小學任教，都無時無刻不把握機會，將 國父領導革命的意義和精神，講給同學和學生們聽。還記得新寧中學要舉行畢業晚會的時候，我和幾個同學自編自導排演了一齣「四大聖」的粵劇，內容全係歌頌 國父、陳少白、尤烈與楊鶴



民國三十七年三月二十九日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一次會議國民政府主席 蔣公在會場內與海外代表晤談時之情景，右二爲本文作者。



二第)影留後陵謁表代外海夕前會開會大民國屆一第日八十二月三年七十三國民

(者作文本為人四第起右排)

齡等四位先生，並表示我們贊成革命的堅決主張（按：當時有人稱前述四位革命領袖為「四大寇」，我們憤其擬於不倫，覺得侮辱了他們的人格，也歪曲了他們的動機和精神，故把「四大寇」改為「四大聖」編成一劇，欲藉此糾正世人的視聽，並喚起世人對革命的同情與贊助），不料正式演出之前，事為學校當局所知，雖極表嘉許，但恐引起清吏的注意，鬧出麻煩來，禁止我們演出，這事到現在想來，我仍覺得是一件最大的遺憾。

國父言論影響

一八九九年，我已經九歲，在長輩們的指導下，已能湊合著做幾首歪詩，至於寫普通的文章，那是日課。此時我對於文字的運用進步很快，求知的慾望亦因而大為提高。前文說過，讀那些古書，我當初的興趣確實不濃厚，總想另外找些新鮮的東西看看，特別是有關國父革命的言論和主張，到這時我所知道的，仍然得之於街談巷議，道聽途說

，這些傳言，往往與事實的真相相去甚遠，刺激是够刺激，但我卻不以為刺激為滿足，總想多讀一點。國父與諸先烈的文字，然雖經多方蒐集，終不能得。就在這時，聽人說「四大寇」之一的陳少白先生，在香港創辦了一份「中國日

報」，我把這消息暗地裏報告我的父親，他對這個消息也很感興趣，偷偷地寫了一封信給僑居香港的親戚，要他按期替我們訂購寄回。翌年春，我們接到第一份「中國日報」，真是喜出望外，關起門來兩父子擠在一起翻來覆去的看，但卻沒有看出什麼激烈的鼓吹革命的言論來，感到很是失望。一直過了半年多，報紙上的言論才漸漸激烈起來，我現在還清楚記得其中一部分最精彩的文章，是力闢康有為、梁啟超等所倡的「保皇」之說，真是名家手筆，字字珠璣，語語驚人，迴腸盪氣，擲地有聲。遇到這種文章，我除了背得滾瓜爛熟之外，還要一字不漏抄下來，到處傳觀，而凡是看過的人，我發現他們無不拍案驚奇，大表同情於國父的革命主張，不直康、梁所為。我自己更是從那時起，益加傾向於革命，對國父及諸革命先烈的人格，推崇備至。這時，我又產生了另一種強烈的慾望，就是想看看這四位革命領袖的風采和聆聽他們的言論。後來祇有國父孫中山先生於我移民美國時見到了，其他陳少白、尤烈和楊鶴齡三位先生，却始終未曾見過面。

赴美發展僑教

大凡青年人，祇要不是天生的低能兒，都有一番雄心壯志，不甘碌碌以終其生，陶淵明詩云：「壯志猛四海，竊願思遠翥」，正是青年心理的寫照，他們有理想，有魄力，不怕難，不怕苦，不願向命運低頭，敢於向一切險惡困阻挑戰，這就是年輕人的可貴處。

我家是一個大家庭，但經濟一直不够富裕，如遇風調雨順的年歲，全家大小努力耕作，尚能維持溫飽；一旦發生災歉，五穀不登，那就光是開門七件事，便不免要捉襟見肘，窮於應付了。

我在育秀小學任教，因為學校當局及地方人士的不斷挽留，一待就是七年，也就是說經過革命成功，清帝遜位，到了改元後的中華民國六年，這時我已廿八歲。有一天，和幾位從美國回來的華僑在一起吃飯，他們談到海外的華僑學校亟



嚴總統早年接見本文作者陳篤周先生聽取報告僑情時留影。

須向國內聘請優秀的教師前往任教，僑教才有在海外紮根的可能，並即席徵求我的意見，願不願為振興海外僑教而放棄現在的工作。經過我的審慎考慮之後，在國內要找像我一樣甚至比我更好的教師，絕無困難，而在海外就不那麼容易，因此，我想如果辭掉育秀小學的職務，學校不會找不到更好的老師來補充，而到海外去撒播中華文化的種籽，是一件多麼有意義而值得嚐試的事，於是我乃欣然答應，但學校當局及地方人士却極表反對，堅決不准我辭職，不知費了多少唇舌，才說服大家。

民國六年八月，抵達舊金山，在未出國以前，我總以為初履異邦，人情風物，皆與祖國不同，恐難以適應。詎料僑胞們的熱情，幾乎要把我溶化了，因為他們早已得知有一位熱心僑教的年輕老師，要來此間任教，一切生活所需，預先已替我安排妥當，什麼也不匱乏，真令人有賓至如歸之感，也使我想到中華民族原是世界上最多的民族，如果能把這種同胞愛更加擴充發揚，化為力量，則漫說救國保種絕無問題，就是把這種力量用來維持世界的和平，增進全人類的福祉，也是辦得到的。想到這裏，我不禁對 國父所領導的革命，寄以無窮的希望。同時也想到自己應該多多利用機會，向華僑們宣傳現在滿清政府已被推翻，則凡屬有血性的中華兒女，無論身居何地，都應該出錢出力，來幫助革命政府，從事新中國的建設。

要使我的宣傳工作能在僑社中順利開展，並發生作用，我決定先做到以下幾點：一、多充

實自己的學識、經驗；二、不斷注視國內的動態；三、盡可能蒐集諸位革命領袖的言論文章，和鼓吹革命建國的報章雜誌，熟記於心，隨緣說教；四、對於教學和校務的改進，必須全力以赴，特別認真，藉以贏得僑胞們的好感；五、在不妨礙教學的原則下，盡量加入僑胞們所組織的各種社團，和他們打成一片，加強宣傳的影響力，此外，為了擴大影響，我還想如時間、金錢許可，擇要辦一些文化事業。以上是我初到舊金山時所立下的宏願和以後行事的方針。

一到舊金山，我即受聘擔任中華中學的教席。臨去國時，我曾考慮到僑生的課外讀物問題。由於那次赴美是搭郵輪（那時候還沒有飛機），可以多帶一些行李，我個人日用之物十分簡單，倒是帶了不少箱我國的古籍，我想將來一定派得上用場。果然，因為僑生都身處異邦，除在校內所授的中文課程外；課外活動時，幾乎接觸不到一本中文書。我爲了要加強他們的國文程度，便利用學生愛聽鬼故事的心理，先在「聊齋誌異」和「閱微草堂筆記」中，每週挑選一篇，油印分發給每一位同學閱讀，另外，並利用課餘之暇，講寫章回小說的故事給他們聽。記得我在該校任教十餘年中，連講帶寫，供給同學們的課外讀物，計有：聊齋誌異、閱微草堂筆記、三國演義、西遊記、水滸傳、精忠傳、東周列國志、世說新語、戰國策、莊子、論語、孟子、大學、中庸、資治通鑑、東萊博議，以及前人筆記小說等數十種之多，總算對於介紹祖國文化，盡了一點棉薄之力。

創辦國民書局

我又認為，要使中華文化在海外生根，學校固不失為重要的據點，但對象僅限學生，而散居各地的成年僑胞却被忽視。因此，當我在舊金山的人事關係達到一定程度之後，乃分別進行游說，創辦一家書局，專門出版中國書籍，做為僑胞們的精神糧倉。奔走的結果，大大使人興奮，凡當地僑領無不贊成，所以，不久一所頗具規模的「國民書局」就在羣策羣力下很快的組織成功，此時，我除了仍任中華中學教席外，並負責國民書局的編審工作。一天到晚，幾無暇晷，好在那時年富力強，熱情洋溢，加以無論學校當局及書局的董監事們，都對我信任有加，推崇備至，「士為知己者用」，我也不覺疲累，越幹越起勁。

由於這些年的成績，使僑胞們對我刮目相看，不久便有人推荐我加入陳氏宗親會並被選為該會總理，不久，又被推舉為中華總會館的總董、商董以及寧陽總會館主席、美國和平總會會長、中華中學校董會主席。迨國民黨總支部在美成立，我又連任三屆總支部常務委員及歷任委員，另外一所「建國中學」的校董也由於我在固辭不獲之下，歷屆都由我擔任。自從一肩承擔這一大批僑社工作之後，雖不敢自比於「一飯三吐哺，一沐三握髮」，但忙碌的情形誠不足為外人道。在這種情形之下，我不得不辭去教學的工作，把全部精神集中於黨務、校務及各社團業務的整頓和發展。其時，國內有梅芳學校、國民大學、廣州

大學之籌辦，均陸續派人來國外募款，我覺得振興國內教育，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很樂意幫忙，而這些來募款的人，也很想借重我對僑界的熟識，他們一到舊金山，差不多都要找我，於是我就義不容辭，奔走勸募，總會使得他們不致失望。故這些學校後來辦得有聲有色，我也覺得欣慰。

支持政府抗日

民國廿六年七月七日，蘆溝橋事件爆發，我國對於日本長久以來的容忍，已經到了極限。於是蔣委員長在廬山發表談話，揭起了全面抗日的怒潮。海外僑胞聞訊，無不表示擁護；支持政府抗日到底，並隨即組織「旅美華僑統一義捐救國總會」，推選我任主席，積極推動救國捐獻工作，並曾勸銷國幣公債兩次，成績均相當可觀。除了募捐之外，我還竭力鼓勵青年僑胞回國參戰，聞者無不義憤填膺，紛紛請求回國加入抗日陣營，在強敵壓境下，凡我中華兒女，不論身居何地，都表示了一次空前的禦侮大團結，終使日寇授首，贏得光榮的勝利。

其時國民黨海外部副部長蕭吉珊先生來美推動精神總動員運動，經過我與旅美各地僑領的奔走聯絡，這一運動乃在美國各地僑社中普遍開展，並建立了許多堅強的據點，俾作永久活動的中心，以宏績效。後來，又有梅芳中學的校長吳敏輝女士來美推動蔣夫人所倡導的新婦女運動，我當然又是義不容辭，全力協助，終於在美西、美北各地成立分會。又其時，廣東人民發起一項購

機報國與救濟捐運動，因旅美華僑中，大多數均籍隸廣東，於是我們在海外外的粵籍僑胞也紛紛響應，共襄盛舉。當李漢魂先生主持廣東省政時（民國二十九年至三十四年），時任航空委員會秘書長的陳慶雲先生發起航空救國運動，就商於我，我立即答應為他推銷美金公債七十萬元，由於僑胞對於國家的熱愛，及對我個人的愛護，均慷慨義囊，如期募足。又當滇緬路通車的消息傳來，我們知道運輸工具對於戰爭及交通之重要，遂發起捐車運動，於一夜之間，募得大型救生車十輛，作為運送傷患之用。綜括言之，旅美華僑統一義捐救國總會，在八年抗戰期間，為表示僑胞對祖國的效忠和熱愛，除上述募捐之外，尚曾發起三次「一碗飯」運動，共籌得美金六百多萬元，悉數匯繳政府。我們知道，八年抗日，國家糜費不貲，區區六百餘萬美元，誠屬杯水車薪，無補時艱，然我們固已盡了最大的努力，而於鼓舞國內軍民士氣方面，當不無作用，即外國人士，亦對中華民族之不可侵犯，有了更深一層的認識，故在國際宣傳上，也是很有意義的。

當選國大代表

抗日勝利後，政府主張還政於民，民國三十六年，舉行海內外行憲國大代表選舉，我由於僑社的抬愛以及政府的拔識，膺選為美西區國大代表。翌年回國參加第一次國民代表大會，選舉第一任正、副總統，並奉旅美華僑統一義捐救國總會之命，向政府交涉發還美金公債利息二十一萬餘元，蒙政府慨然允諾，此款後來全部用來建築

勝利堂一所，以紀念抗日勝利，且蒙總統 蔣公賜題正門匾額，益增榮寵，華僑們無不大為感奮。有一次蔣夫人由紐約到金山，當晚在勝利堂開歡迎大會，座為之滿，蔣夫人即席發表演說，對僑胞們的愛國大義讚不絕口，對蔣周尤多獎飾之詞。顧蔣周能鮮德薄，何敢掠全體僑胞之美，不過於國難當頭，盡其一分子的責任而已。

抗日勝利，頑敵膺懲，我政府方期與民休養生息，乃共匪乘機坐大，終於在卅八年全面竊據大陸，政府播遷台灣，繼續反攻復國大業。當政府依照憲法，召開國民代表大會選舉第二任正、副總統時，蔣周奉召回台，攜帶中華總會館購機運動捐款美金數萬元，面呈總統 蔣公，表示政府無論處於何種境況，華僑仍當一本初衷，擁護到底，當蒙 蔣公多所嘉許，至今引為殊榮。

我蒙國代同仁不棄，曾前後兩次當選為主席團主席。當第三任總統選舉前，我鑑於當前國家處境十分艱難，非有一位像總統 蔣公那樣英明睿智的元首繼續領導，恐不易渡過難關，乃於選舉前，首先自美發表通電，擁護 蔣公競選連任，全球響應，而為全國人民所付託之國代諸公，皆能深明大義，對我的通電，莫不視為明智之舉，而 蔣公亦在全民擁戴之下，順利當選連任第三屆總統。

華僑反共總會

民國三十九年，中共匪軍甘為俄帝鷹犬，受其唆使而發動百萬大軍，幫助北韓南侵，屠殺美國子弟，因而引起美國人民對我族美華僑的仇視。

。我以為匪軍殺人，罪在匪軍，實不應禍及善守法的華僑，蓋他們也同樣痛恨共匪的窮兵黷武，無端肆虐。於是經過我與僑界緊急磋商，乃共同組織華僑反共總會，推舉我為主席。本會組織之宗旨，乃在昭告美國朝野，雖華僑與匪軍同為中國人，但彼此的政治立場是涇渭分明的，切不可混為一談，同時我們還把這個組織由舊金山推及斐士那 (Fresno)、士作頓 (Stockton)、洛杉磯 (Los Angeles)、沙加緬度 (Sacramento)、加州首府 (西雅圖 (Seattle) 及砵崙 (Portland) 等城市，互為聲援，一致反共。自此以後，由我在美所領導的反共工作，乃由非公開而半公開而全面公開，亦由此才把美國朝野的觀點糾正過來，知道我們華僑都是非共和反共的。

最近十多年來，每逢雙十國慶的慶祝活動，都由蔣周負責策動，除鼓勵僑胞們盡量回國參與慶典外，並在僑居地舉行國慶公宴及舞龍舞獅等大遊行。最近四年，又另外推動一項於每年十月一日舉行追悼大陸死難同胞運動，以打擊、對抗共匪的「十、一」偽慶，凡此舉措，皆能引起國際友人的重視，亦蔣周以垂老之年，所能報效黨國的最大限度的工作。

黨務僑務工作

五十八年，中央召開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我代表中國國民黨駐美國總支部參加這次具有歷史性的大會。當時大會決議聘請海內外同志為中央黨務顧問，蔣周不才，亦獲榮任斯職，以迄今茲。又行政院僑務委員會於二十多年前，聘我為

僑務委員，直到現在，仍固辭不獲。

結語

以上所述，不過蔣周在海外奮鬥六十年的梗概，良以蔣周受黨國及僑社栽培，其恩其德，如獄如淵，是怎麼也報答不完的，些須小事，乃一個黨員及僑民應盡的一點義務，今乃筆之於文，誠或不免貽笑大方。好在賤軀尚稱頑健，只要一息尚存，決與共匪周旋到底。我是稍解古籍的人，證諸往史，像共匪這樣殘民以逞的暴政，決無倖存久存之理。我這個離開故鄉已六十年的八七老人，正充滿信心可以及身而見中共偽政權的煙飛灰滅，土崩魚爛，望我賢明領導當局，領導全民，把握時機，揮師北指，光我禹甸，復我神州，讓大陸八億同胞，重過民治、民有、民享和自由、平等、博愛的生活。

河上人語

宋希尚教授著定價叁拾元

本書為宋希尚教授精心傑作，宋教授早歲獻身國家建設，參與導江、導淮、導河諸工作，勞苦功高，有「水利國士」之譽，全書收集記遊、記事、描寫人物等懷舊憶往之作三十餘篇，印刷精美，穿線平裝，郵撥一四〇四四號。